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曾国藩全传(上)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出身农家	(1)
一、但以箕裘承祖泽	(1)
二、孝闻乡里的父亲	(7)
三、性格刚毅的母亲	(13)
四、曾门家法有传人	(18)
第二章 景仰乡贤	(23)
一、湖南与湖南人	(23)
二、经世派的崛起	(29)
三、早年两知己	(33)
四、曾门第一个进士	(39)
第三章 锐意进取	(45)
一、圣贤英雄皆可为	(45)
二、砥砺人生的师友	(48)
三、改易品性的艰难历程	(61)
四、得不到“炭敬”的穷翰林	(73)
五、理学之外的经世学问	(78)
第四章 天子近臣	(83)
一、内忧外患，推源祸始	(83)
二、高位不失书生本色	(86)

目 录

三、署理部务,每日“自课八事”	(94)
四、陈民间疾苦,指皇帝缺失	(99)
五、受穆相赏识,八年六迁	(107)
第五章 生死不弃	(118)
一、不忍坐视桑梓之痛	(118)
二、别开生面,赤地立新	(125)
三、取法“戚家军”	(133)
四、精神训练与思想灌输	(143)
第六章 场面狭小	(154)
一、越俎代庖,不避嫌怨	(154)
二、群疑众谤,移师衡州	(160)
三、筹办水师,意在长江	(164)
四、营垒内部的矛盾	(172)
五、潜龙在渊,四拒旨令	(179)
第七章 初试锋芒	(188)
一、传檄出师,“胜过百万兵”	(188)
二、出师不利,首次自杀	(191)
三、“咬牙立志”,整军妙高峰	(202)
四、左、胡相助,“引用一班正人”	(206)
五、攻取武汉,有功不赏	(227)
六、言词激烈,重劾崇纶	(237)
七、调和诸将,胡林翼抚鄂	(241)
八、“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244)
第八章 困顿江西	(249)
一、兵败湖口,再次自杀	(249)
二、惶惶终日,赧颜入江西	(257)

三、“闻春风之怒号，寸心欲碎”	(264)
四、仰食他人，跌蹶经营	(268)
五、同年反目，参奏陈启迈	(275)
六、罗泽南援鄂，处境更难	(281)
七、坐困南昌，力支危局	(285)
八、蓄势待机，“曾家军”入赣	(290)
第九章 一生三变	(301)
一、“家门有大故，游子心不安”	(301)
二、委曲心事，委军守制	(307)
三、反躬自省，全无是处	(314)
四、身在纯庐，心系军旅	(323)
五、军需报销，为“部费”发愁	(327)
六、追思先人，改葬父母	(331)
七、朝野奏起，重返军营	(336)
第十章 历尽艰辛	(345)
一、援浙援闽，均未成行	(345)
二、三河喋血，精锐尽失	(348)
三、磨砺人才，李鸿章入幕	(355)
四、不去四川当“作客”	(359)
五、兵分四路，“办窃号之贼”	(363)
六、初战太湖，进围安庆	(365)
七、署理江督，“天意岂有转乎”？	(370)
第十一章 运筹帷幄	(376)
一、钦差大臣走稳着	(376)
二、总督立规矩，政事新气象	(381)
三、曾国藩大开口，左宗棠出山	(387)
四、身困祁门，“实无生人之趣”	(394)

五、北上“勤五”，缓字应之	(406)
第十二章 攻取安庆	(411)
一、旋转之机，取势千里之外	(411)
二、“不以多杀人为悔”	(417)
三、人琴并亡，为胡林翼请功	(424)
四、关注朝局，虚望太隆	(430)
第十三章 如临渊履冰	(435)
一、谋取江浙，别立淮军	(435)
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441)
三、态度强硬，不授洋人凌我之势	(445)
四、曾国荃孤军逼金陵	(453)
五、惊心动魄的四十六天	(457)
第十四章 东南无主	(465)
一、紧缩包围圈，困死金陵城	(465)
二、凄风腥雨秦淮河	(469)
三、杀李秀成这谜	(474)
四、部属“劝进”，扑朔迷离	(480)
第十五章 持盈保泰	(485)
一、乱世功名，尤为难处	(485)
二、推权让利，才能晚场善收	(489)
三、韬光养晦，留淮裁湘	(492)
四、曾、左龃龉，留下百年谜底	(499)
五、“重整河山”，勉力为之	(503)
第十六章 剿捻失败	(512)
一、僧王战死，奉旨平捻	(512)
二、不违王命，万难迅速出征	(516)

三、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522)
四、收服悍将,约法三章.....	(525)
五、师老无功,防河失败.....	(528)
六、疑谤丛集,求退图保全.....	(530)
七、位高权重,难以息肩.....	(538)
第十七章 倡办洋务	(543)
一、近逼卧榻,世变正未可知.....	(543)
二、“中国岂可一日而亡备?”.....	(549)
三、“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	(553)
四、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565)
五、开历史先河与不可克复的矛盾	(569)
第十八章 勉为其难	(574)
一、晋见慈禧,位次汉大臣之首	(574)
二、改造绿营,兴办练军	(581)
三、清理积案,整肃吏治	(585)
四、兴修水利,防杜河患	(589)
第十九章 办理教案	(595)
一、震动朝野的天津教案	(595)
二、抱定必死,再立遗嘱	(601)
三、“惟有委屈求全之一法”	(604)
四、众矢之的,谤议丛积	(613)
五、“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	(619)
六、怅惘无限,三任江督	(628)
第二十章 毁誉不计	(631)
一、审定“刺马奇案”	(631)
二、整军经武,致力自强	(636)

目 录

- 三、“日夜望死，犹见宗社之陨” (640)
- 四、痛自刻责，期在“三不朽” (647)
- 五、长逝金陵，“生荣”死亦哀 (651)

第一章 出身农家

一、但以箕裘承祖泽

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公元1808年。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新迁来一户人家。新迁来的人户姓曾，共有十几口人，属中等人家，长者人称竟希公，时年已逾周甲，白须飘逸，俨然仙者。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业农，几百年间饥饱不均，难以摆脱贫困的生活。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家业日渐发达。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40亩薄田。在农业社会里，置房购产自然是经济实力的主要体现。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为不拖累后代，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40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已届古稀之年的曾元吉病故。他的子孙们靠着分得的家产，开始过上了衣食无大忧的生活。仅靠出租土地的租金就能维持生计。嘉庆二年，为纪念惠及后人的曾元吉，曾氏族长召集族人，决定将一年的租金收益拿出来，在圳上购置祭田10亩，每年清时节，后人前往祭祀。曾元吉在衡阳留下的40亩田，不久也定为祀田。

曾元吉有六个儿子。次子曾辅臣，号辅庭，娶蒋氏为妻。比起上一辈人，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曾辅臣分得一

份家产，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仅55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

并不富裕的生活养成了曾竟希俭朴的作风。他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时，父亲给他一百文银作零用。五月归来，把九十九文交给父亲时，受到父亲的赞扬。

曾竟希有着农民的忠厚传统，为人颇为厚道。三四十岁时，家乡来了一位四川游客，俩人情投意合，很快结拜为兄弟，川客也就寄居在曾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一住十余年。久寄他乡思归离。一天，川客对曾竟希说要回四川去，曾竟希苦苦相留。川客说：“贤弟不要难过，我离家多年，回去看看，还要来的。”曾竟希难舍难分地说：“自古道‘少莫入广，老莫入川’，四川路遥山峻，你如今已年届半百，回到老家，怎么还能再来？”川客却信誓旦旦，说：“我一定来与贤弟共享高帽山之乐。”说罢，兄弟二人跑上高帽山观望，选定山麓的大西冲一处地方，打下木桩，作为两人将来的葬地。川客对曾竟希发誓：“不管谁先去世，左边（此地习俗左大右小）葬你竟希君，我拣右边。”曾竟希说：“你兄长，该葬左边。”两人再三推让，珍重而别。但川客一去不返，音讯杳然。（《曾国藩家世》，第46页）

迁入白杨坪的第四年冬，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老人惊悸之余，正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竟希老人忙把儿孙召来，告诉刚才所梦，并说：此乃祥兆，他日这个孩子必定光大我曾氏的门庭，你们要好生看护！

家人来到院落，果见一株苍藤，形状妖娇屈蟠，与竟希老人梦中所见十分相像。从此，曾氏族人与远近乡人都把这株苍藤与这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枝繁叶茂时，他就登科、升官，在

战场上会连连取胜；苍藤如果枯槁凋零，他就会连交厄运，不是罢官革职，就是丁忧在家，打仗时也会险象丛生。这则远近悉知，父老相传的久远故事的主人，就是乳名称为宽一的男孩。他就是本书的传主——曾国藩。曾国藩的出世，寄托着曾家多少代人的希望。尤其让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喜不自禁。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因此，自从长媳有了身孕后，曾玉屏就希望曾家后继有人，是个男身。为此，一向不信占卜的他，破例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占卜的结果偏偏是个女孩。曾玉屏急得求神许愿，祈求生个男婴。长媳临产那晚，夫人去接生，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夫人接完生回屋，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平时在丈夫面前大气不敢喘的夫人，此番竟要成心逗一下丈夫，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千金”。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正好此时儿子曾麟书兴冲冲进来报是男婴，曾玉屏一听顿觉喜从天降，立即大筵宾客。

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在曾国藩身上，似乎都可以印证“隔代遗传”的“基因密码”。

曾玉屏，号星冈，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他还没有起床。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

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早在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湘潭：

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
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
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
清绝潇湘春唱和，竟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两岸飞鸿贴水鸣。
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

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从湘乡到湘潭不足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年长人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马卖掉，徒步回到家中。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时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35岁那年，他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

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凿石山，开垦荒地，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这样一来，种田人才好耕作。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此为乐。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又养鱼，这样那样的事，从来没有停过。

从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十分自得。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嫩肥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

勤劳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始则怀疑，继之赞服，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

在早年不发达的农村，重男轻女十分普遍。看一个家族兴旺与否，主要看人丁是否兴旺。而这个“人丁”就是指男丁。如果一户人家膝下无男，往往被人看不起。因此，长孙曾国藩的出生，预示曾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有不可限量的前途。曾玉屏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他回想起自己的先人自从元朝、明朝时就住在湖南衡阳之庙山，几百年间都没有立宗祠，于是便与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商量、筹措，建立了祠堂，并定于每年十月举行祭祀。又与家族中人商量，另外立一祀典，每年三月举行祭祀光大曾门的曾元吉。

曾玉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经常告诉后辈人：“世间一般人消灾求福，往往祈于神灵，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能够降福保佑自己的，莫过于自己的祖先。因此，我每年设祭，特别重视生我养我的祖先，而对其他的祭祀，则不很重视。我们曾家，后世即使

贫穷了，但礼教不可毁坏；子孙虽然愚笨，但家祭不可从简。”这些对后来的曾国藩有很大影响。

曾玉屏早年失学，成年后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因此既令子孙拜名士为师，自己也喜欢交结文人，希望他们经常登门。认为那些饱学之士，来家作客，能使寒舍增辉，是最高兴的事。对那些品格端方，老成稳重的人更为敬重，从不敢怠慢。一般的亲戚朋友也热情接待。至于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道士和尚、看风水、算命看相之辈，则避之惟恐不远。而对于那些落魄了的穷亲戚，则款待隆重，唯恐不周到。

乡里人看着曾氏一家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亲疏分明，自然预知这一家今后的兴旺。每当乡里邻居、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从不委派晚辈去应付，而是亲自登堂，郑重其事。久而久之，曾家在白杨坪远近数十里，也就颇有声望了。若有亲友财力缺乏，不能办事，曾玉屏就拿出积蓄资助。邻里间若发生争吵诉讼，也出面居间调停。对于那些特别横蛮不讲道理的人，则严厉呵责。大多数场合都是曾玉屏摆桌酒菜，在桌面上化解矛盾。曾玉屏说：所谓正人君子，若是在民间作普通布衣百姓，则要排解一方之难；若是在朝廷当政为官，则要安定社会、平息动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可见，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曾玉屏都化为实用的锦囊。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低辈分的曾家人更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对于曾国藩的父亲麟书、叔父骥云兄弟，管教尤为严厉。对长子曾麟书责求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喃喃，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

墙，蹑蹠徐进，愉悦如初”。

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已入翰林。曾玉屏对儿子曾竹亭说：“宽一（国藩）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是年十月，曾国藩进京散馆。离家时，侍祖父曾星冈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而是“要言不繁”，这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曾玉屏还有一句座右铭式的话：“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留条后路。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祖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二、孝闻乡里的父亲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有“慈母严父”的说法。但曾国藩父母的性格及家庭角色却迥然不同。他的父亲曾麟书更像一位慈母。

湘乡大界曾氏自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起，虽然各代都有读书人，但都没有考取功名，因此只能“累世业农”。曾玉屏成家立业后，深以“不学为耻”。但支撑偌大一个家庭，使他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蟾宫折桂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子曾麟书身上。曾麟书号竹亭，乾隆五十五年（1790）生。他深知父亲的

苦心，因此早年即积苦向学。但因天性“钝拙”，一连参加 16 次童子试都榜上无名。眼见功名无望，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近不惑的曾麟书仍未考中秀才，于是在家乡开了私塾，取名为“利见斋”，招收十几个儿童。当时年仅七岁的曾国藩也开始受父课读。自此，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

在封建时代，要想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农家子弟，生活都难以维继，整日能端着书本，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到《大学》、《论语》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是需要良好家庭条件的，最基本的是衣食无忧。曾家到曾玉屏时，也只能算过得下去，谈不上富裕。但由于“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中国的先民又十分重视读书。农村有句谚语，叫“穷读书，富养猪”，是农业社会的真实写照。从曾玉屏晚年还要亲自下田劳作看，曾家走的是“以耕养读”的路子。就是说，家庭条件虽不算优裕，但由于长辈重视，因此一代又一代总不乏读书人。

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这是一条异常漫长的路，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没有达到“优则仕”的人而言，最多的出路是开个私塾，教授生徒，混口饭吃，而这种职业也是颇受人尊敬的。开私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招收家族子弟为主，二是招收他姓子弟。前一种带有族内“公益”性质，他的收入不是来自生徒交纳的学费，而由族内专项经费支出。后一种属于“营利”性质，但收费高低，一则看教书先生的名望大小，二则看生徒的家境状况。曾麟书开的私塾虽然属于前一种，但他还是取了个俗气的名字——利见斋。

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以陈雁门老先生作为问字之师，所学即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相当于学前教育。父亲开馆授

徒后，曾国藩开始系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父亲的角色本来就是多重的，曾麟书便可以说是曾国藩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有一股韧劲儿，那便是不厌其烦，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父子俩睡在床上，走在路上，曾麟书随感而发，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曾麟书是久经科场的人，他失败的阅历使他认识到一曝十寒对读书人的危害，因此他把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每天都为小宽一安排固定时间读书，从小训练扎实的学风。曾麟书不但每天规定儿子固定的读书时间，并且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

少年的曾国藩还是很聪明的。从父亲习学二年，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五经》。从10岁起，开始试作八股文，即为考取功名做准备。由于曾麟书认真督教，在取得同族人的信任后，他随即设馆同族家塾——锡麒斋。他希望曾氏家族能多出几个像麒麟一样，满身披挂的人物。当然，更多而更现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曾国藩在此受教《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

道光四年（1824），14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从父亲来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童试三年两考，是考取功名的第一阶梯，由于广大农家都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改变家族命运的惟一途径，因此大凡生活能过得下去，就要子女走科举一途。这样一来，在社会中形成了尊重读书人的良好风气。但由于名额有限，所以考取十分不易。在文化发达的省分尤其如此。湖南相对全国而言，当时文化尚不算发达，但相比较而言，长沙府的竞争就非同一般。这一次，父子俩同赴考场，但双双落第。

科场上屡试不售的曾麟书似乎失去了自信。近二十年间，他

为了改写曾氏家族“冷籍”的历史，几乎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但前望途程，仍是一片空白。他不想让儿子曾国藩遭受自己一样的挫折。因此，与父亲商量后，曾麟书决定让曾国藩出外就学。曾家因是从衡阳迁移到湘乡的，加之两县接壤，故而对衡阳的情况自然比较了解。曾玉屏父子早就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并在唐氏家塾设课授徒，于是便决定把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先生在衡阳所设的唐氏家塾去念书。这样一来可改变一下环境，便曾国藩有一种新鲜感，产生新的求知欲；二来改变一下父亲所传授的教学方法，把读书与做八股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道光十年（1830），20岁的曾国藩像所有士子一样，背负行囊，远离家乡和亲人，开始了外出求学的历程。

曾麟书的这一决定，对于儿子日后的前程而言，怎么讲都不过分。

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阳而得名。早在三国时代，就以衡阳郡而名闻遐迩。自宋代始，衡阳的文化跃上全国的重镇。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其中之一的石鼓书院就座落在衡阳城北的石鼓山。尽管岁月磨蚀，战火不断，但皇帝钦赐的“石鼓书院”四字匾额仍然斑迹可寻。

曾国藩的求学地是在衡阳县北的双桂书院。这是金溪人唐翊庭创办的一座书院，时人又称为桂芳书屋、桂花轩。双桂书院不但请来了汪觉庵老先生执教，而且以经世之学相倡导。这对不闻外间事的青年曾国藩而言，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多少年后，他还在《金坑唐氏续谱序》中带着感激而又怀恋的心情写道：“往者，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余从学焉”。“书院以‘导进人才’为目的，……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以议论时政，常采用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越八年，余入词垣（指入翰林院）。”